

# 见证辉煌历程 感受诗意空间

## ——胡松夏长诗《共和国乐章》序

□ 商泽军

公元2009年10月1日,我们伟大的祖国将迎来她的第60个生日。60年风雨历程,感动与激情相约;60载辉煌岁月,祝福与赞歌飞扬。金秋十月,将是我们最欢庆的时刻,最光辉的节日,最隆重的庆典。

在这个充满激情与喜庆的日子里,战士诗人胡松夏利用业余时间创作完成了长诗《共和国乐章》,这是作者继《绿色笔记》《金戈铁马》之后的又一部作品。作者胡松夏是一名普通的解放军战士,同时也是一位年轻的军旅诗人。他爱好文学,尤其喜爱现代诗歌的阅读与创作,已创作了不少优秀作品。由于长期工作生活在基层部队,诗人对火热的军营生活十分熟悉,因此他的作品激情澎湃,诗风清新质朴,文字间时常洋溢着军营特有的阳刚与青春的气息。

《共和国乐章》是一部以热情讴歌中国共产党为主题的恢宏史诗。诗人用艺术的形象思维和诗性的语言对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一些重大史实进行了倾注和再现,其中既有峥嵘岁月也有艰难探索,既有辉煌成就也有曲折历程。作者始终坚持以史为纲,以诗咏史,以特有的视觉洞察历史,以军人的情怀咏唱时代,热情讴歌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创

造的辉煌历史,以及带领人民群众创造的丰功伟绩,热情讴歌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作出的艰难而伟大的抉择!史诗,是源于古希腊的一种诗体,与一般的叙事诗、抒情诗等有明显的不同,它有着特定的内容和特定表达方式。哲学家黑格尔曾说过:“史诗是一个民族的‘传奇故事’,‘书’或‘圣经’。每一个民族都有这样绝对原始的书,来表现全民族的原始精神。”史诗既不是历史教科书也不是一般的诗歌,它具有一定的严肃性和文学性,是历史与诗歌的融合,是诗歌与历史的再现,古希腊著名诗人荷马创作的《伊利亚特》和《奥德修记》,都属于于史诗的范畴。由此可见,诗人创作史诗不仅需要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深刻的历史感悟,还需要处理好恰当的叙事与自由的抒情,做到严肃性与文学性的和谐统一,因此史诗的创作具有一定的难度。胡松夏尽管是一位年轻的基层战士,但却以高度的责任感,刻苦研究中外史学,积极进修古今文学,以饱满的激情业余创作出了这部气势恢宏的史诗性诗篇——《共和国乐章》,是一件十分值得祝贺的事情。

《共和国乐章》共分为“序曲”、“日出东方”、“艰难探索”、“走进春天”、“时代

放歌”、“世纪交响”以及“尾声”七个部分,全书紧扣共和国历史的发展脉搏,以“南湖的红船在岁月的长河中前行”为主线来进行叙事与抒情,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至2009年1月6日我海军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的舰艇编队开始第一次护航行动止,时间跨度为60个春秋,以发展进程中的一些重大史实为选题进行艺术加工,组合成为七个部分,完成这些工作更需要具有诗歌创作熟练的手法和一定的写作技巧。“序曲”作为《共和国乐章》的开篇之作,直接切入主题,接着将漫长的历史引向现实的生活。“是谁/用虔诚仰望华夏的时光/一次又一次在日月的轮回中感动/是谁/用执着凝望着炎黄的历史/一次又一次在岁月的辉煌中震撼”。“日出东方”开首更是简洁明了,“1949年10月1日/北京/新中国的心脏/天安门广场/全世界的焦点/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华儿女翘首以盼/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的到来”。诗人在创作过程中没有回避共和国发展过程中的曲折,“艰难探索”中对“大跃进”、“文革”等也进行了较为客观的叙述,“共和国的土地上盛产激情/也盛产激进/这是一个东风

压倒西风红旗招展的时代/所有的地方都开始‘插红旗,拔白旗’/‘面子’的重要逐渐超过‘肚子’/辽阔的原野变成了‘卫星’发射的基地”。对某些阶段时期的失误也站在历史的观点上予以理解,“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没有路标/在探索中前行的时候/谁敢保证不会走一段曲折的弯路”……胡松夏在《共和国乐章》中始终以奔放的笔墨和诚挚的情感驾驭着历史与文学,让读者在见证共和国辉煌历程的时候,可以感受到诗意的空间,感受到诗歌的魅力。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刘勰《文心雕龙》),诗是午夜流淌的星河,诗是心灵进发的回音。一部作品的质量如何,往往取决于诗人综合能力的强弱,由于诗人是一名普通的基层战士,不是从事专业创作的诗人,能在国庆6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创作出长达3000余行的《共和国乐章》已实属不易,我以前也曾创作过一些反映主旋律的作品,但我认为,《共和国乐章》创作主题选择得非常好,语言充满诗意,是一部充满激情的恢宏现实史诗,是人民战士为伟大祖国母亲的60华诞献上的一份特殊礼物。

作为胡松夏的战友和诗友,我衷心地向《共和国乐章》的创作成功。

□ 史之

##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

# 铁兵将军：罗华生

罗华生,原名罗大庆,男,汉族,湖南省湘潭县人,中共党员,1960年8月至1975年8月任铁道兵副司令员。

1922年到江西萍乡安源煤矿做工,1925年加入安源煤矿工会,两次参加工人暴动,任工人纠察队队长。1930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1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7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总司令部特务营排长,彭杨步兵学校政治指导员,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总支书记。参加保卫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二、三次反“围剿”。1934年10月开始长征时,他与团长王开湘、团政委杨成武率部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遵义会议后,进行了四渡赤水,二占遵义、威逼贵阳、佯攻昆明等战役战斗。在率部从松坎移师北上,进行土城战斗中,击退国民党黔军侯之担部。在二占遵义威逼贵阳战斗中,击溃国民党军两个师的堵截,并俘国民党军参谋长1名。红四团沿大渡河西岸北上,执行夺取泸定桥的战斗中,急行军时,罗华生与团政委杨成武一道,飞跑到行军队伍前,站在一个小土墩上,向急行军的队伍进行政治动员,“坚决完成任务,拿下泸定桥”的口号声此起彼伏。罗华生率先头营边行军边战斗,日夜兼程240里,按时赶到泸定桥。红四团领导,在一座天主教堂召开全团干部会议,确定由二连的22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罗华生亲自到二连帮助突击队做准备工作。战斗打响后,22名突击队员,手持冲锋枪或短枪,背背马刀,腰缠12颗手榴弹,奋勇突击。罗华生率三连在后面边铺桥板,边组织战斗。经过一场生死决斗,终于取得了飞夺泸定桥的胜利。为中央红军摆脱国民党军的围堵,挥师北上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聂荣臻元帅题写的中国工农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文中,罗华生的名字作为红四团领导人之一,镌刻在纪念碑的碑文中,永垂青史。飞夺泸定桥胜利后,罗华生和红四团领导一起,率全团官兵克服重重困难,翻越雪山,走过草地,于1935年9月中旬攻占了天险腊子口,给中央红军北上进入陕甘宁根据地打开了通道。在攻占腊子口的战斗中,罗华生随第六连担负正面进攻的任务,几次攻击未能奏效后,他和连长胡炳文商议,进行政治动员,组织三个敢死队轮番进行突击,最后取得了战斗的胜利。长征到达陕北后,罗华生任红一军团第十二师四团政委,团长,率部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山城战役战斗,巩固和扩大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

多次战役战斗。1947年2月,任松江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1948年1月,任东北野战军独立第七师师长。在此期间,曾奉命统一指挥几个师的部队作战,设伏于波泥河,大量歼灭国民党军。1948年9月,率第七师参加辽沈战役,执行围困长春国民党守军的战斗任务。在解放长春的战斗中,指挥部炸掉大房身飞机场,歼灭国民党军一个主力师。长春解放后,奉命率部南下,于10月参加攻克营口的战斗。1948年12月,任第四野战军三十九军一五二师师长,率部入关参加平津战役。解放天津中,担负攻打和平门的战斗任务,全歼国民党守军。翌年6月,率一五二师随第四野战军主力从湖北沙市过长江,挥师南下进军中南,7月上旬参加湘赣战役,解放临湘、岳阳、常德。10月上旬,参加衡(阳)宝(庆)战役,和兄弟部队一道,歼灭国民党军白崇禧集团主力四个师,解放了湘南、湘西地区。此后率部入广西,过融安、柳州,直抵南宁。南宁解放后,兼任南宁军分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南宁地委书记,领导完成了南宁地区十五县境内剿灭土匪4万余人的作战任务,巩固了新生的民主政权。

全国解放后,先后任第四航校副校长,铁道公安部队副司令员,海军旅顺基地司令员,防空军高炮指挥部司令员,1960年8月任铁道兵副司令员。罗华生在铁道兵副司令员的岗位上长达15年,是铁道兵党委领导班子的核心成员。到职后,于同年10月增补为铁道兵党委常委,1963年12月和1969年6月,在中共铁道兵第三、第四次代表大会大会上,均当选为铁道兵党委常委、党委副书记,长期参与铁道兵部队建设和各项任务大政方针的决策。1962年和1964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两次决定扩大铁道兵,增兵24.4万人修建森林铁路、公路和三线铁路建设。罗华生与司令员李寿轩一起,组织机关有关部门研究规划铁道兵建设蓝图,认真落实部队的扩编和修路任务。1965年4月,铁道兵奉总参部命令,以铁道兵第二师和第十三师为主,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工程队第一支队和中国交通部修路工程队第六支队(后统称中国后勤部队),援越抗美,1965年6月开始,相继入越执行铁路反轰炸抢修铁路的铁路保障,以及修建公路的任务。1966年2月,罗华生参加以铁道部副部长郭鲁为团长的中国铁路代表团赴越进行友好访问,并担任代表团副团长。访问期间,中越两国代表团就签订的《关于修建铁路和提供运输设备器材议定书》的执行情况进行会谈,对一些工程项目进行了调整。访问期间,罗华生到第一支队慰问看望铁道兵官兵,鼓励发扬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以实际行动圆满完成任务,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罗华生在职期间,参与组织领导铁道兵部队完成嫩林、贵昆、成昆、京原、襄渝、渝昆、青藏、南疆、北京地下铁道等21条铁路干支线的修建任务,通车里程达4500多公里。他经常深入部队调查研究,检查指导工作。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度铁道兵主要领导因运动冲击停止工作,罗华生以党委副书记之责,耐心做兵部机关各派群众工作,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不间断地组织指挥部队完成各项工程任务。1975年8月,中央军委文件通知,调出罗华生另行分配工作。1987年1月离休。

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91年9月6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1岁。

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月,入延安抗大学习,1938年2月,任延安抗大总校第五期第四大队大队长,在抗大学习工作三年中,由于学习、工作刻苦,受到校部奖励。1940年2月,任八路军——五师教导五旅政治委员,新四军独立旅政治委员,面对独立工作、作战的复杂环境,正确贯彻上级指示,率部转战苏北地区,参加了陈道口等战役战斗,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顽固派的挑衅进攻。1942年10月,奉命率部到山东滨海一带活动,同日本侵略军和日伪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逐步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1943年10月,任山东滨海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参与组织指挥解放郯城、码头、临沂等战役战斗,使滨海、鲁南解放区连成一片。

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9月,任山东军区第二师师长,率部挺进东北。1946年2月,部队改编为解放军第二十二旅,任旅长。同年8月,第二十二旅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二师,任师长。在此期间,率部参加巩固和发展东北根据地的工作,参加了著名的四平保卫战,三下(松花江)江南

“文革”的结束,农业形势逐步好转,粮食基本够吃了,人们就想设法改善生活。吃煎饼最好要卷辣椒酱,佐以大葱和咸菜,或者就辣椒炒小虾、辣椒熬干巴鱼,定会令你食欲大增。有句俗话说得好:煎饼卷辣椒,既解馋又上膘,还治感冒和发烧。再就是摘几个青辣椒,放在火上一燎,抓点盐一并放进蒜窝里捣碎,倒几滴香油,在煎饼里抹上厚厚一层,大口地吃起来,不一会儿头上就要冒汗,嘴里直唾溜,但就是不舍得放下,那过瘾劲就别提了。

有时烙煎饼顾不上做饭,就沓一卷菜煎饼,用新鲜青菜做馅,不外乎韭菜和白菜心,撒点咸盐和辣椒面,再往鏊子上正冒热气的铺底煎饼上抹一层炼好的白猪油。吃上两截子热腾腾的,味道鲜美的菜煎饼,喝口白开水,这顿饭就算对付了。

这些年,煎饼作为商品从家庭走向了市场,我们村就有不少以卖煎饼为生的,一年下来能挣不少钱。有的专门到集市上卖菜煎饼,在三轮车上放个煤球炉,架上的筐盆里分门别类地装着切好的白菜、粉条、豆腐、韭菜、菠菜、萝卜丝等花花绿绿的馅料,一般再加个鸡蛋、火腿肠和小米等,让人自选馅料。现查现卖,那味道不比汉堡包和热狗差那里去。煎饼还从故乡走向了外地,给他乡的人们带去了固齿健胃、喷香味美的绿色食品,也给久别家乡的游子带来了无尽的思念。

有个亲戚在京城偏僻的巷子里开了个羊肉汤馆,辅以故乡的五谷煎饼,号称“羊肉汤泡煎饼”,生意火爆,十余载不衰。据说,有位德高望重、乡音浓重的老将军专门到这里品尝家乡风味,吃过饭后,他情不自禁地说:“还是这顿家乡饭吃得舒适。”

□ 胡安鹏

吾乡吾土

## 故乡的煎饼

我的故乡在山东枣庄,煎饼是故乡四季不断的传统主食。

烙煎饼比较费功夫,记得在没有电磨的时候,头天晚上就要把粮食泡好,第二天天明就得磨推磨,不然会发酵变质。条件好的人家套上毛驴拉磨,那就省劲多啦,我们家没有毛驴,经常是披着星月起来推磨烙煎饼的糊子。

烙煎饼的工具几乎家家必备,一盘直径一米有余的铁鏊子,上面平整光滑。还有劈子,是用竹片子刮出来的,油簿子是专门沾点菜油擦鏊子的,不然会粘在鏊子上揭不掉。烧鏊子要用柴秸和玉米秸等柴火,火不能太大。当鏊子烧热后用勺子舀上一勺煎饼糊放到鏊子上,煎饼糊所到之处便迅速凝固成一层,就是所谓的煎饼。烙煎饼是一个技术活,不但要求煎饼糊磨得要细,稀稠适当,更重要的还在于烙。农家妇女如果不会烙煎饼,别人就会说她笨拙。我母亲做活仔细,能烙一手薄如蝉翼、厚薄均匀的好煎饼。过去,要考察新媳妇会不会做活儿,只要通过烙一次煎饼就可以看出是否心灵手巧、干净利落。

那年月,从煎饼上可以看出一个家庭的经济条件。条件好的,用些小麦另外再加些花生和大豆等杂粮,这样烙出来的煎饼营养丰富,吃起来口感也好,条件差一些的就用地瓜干等粗粮烙煎饼。我们家兄弟多,年龄又小,家庭比较困难,很少吃上香喷喷的细粮煎饼。赶上青黄不接,父亲就买些比较便宜的粗粮,然后再掺些高粱米、小米糠等一起上磨推,烙出来的煎饼吃起来拉嗓子,要卷些又辣又咸的菜才能下咽。

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中期,农村逐步普及了打面机,减轻了不少劳动强度,起码说我们不再起早贪黑地推磨了。除了烙煎饼之外,还可以把地瓜面、玉米面团成面蛋在鏊子上滚煎饼。随着

作者单位:十七局集团

◆ 瓣心香

## 季老 您一路走好

□ 范佳新

季老,前些日子,我在读您的著作《季羡林谈读书治学》时,还默默祝福您健康长寿。想不到7月11日,您走完了98个春夏秋冬……这一去,国学中从此没有了泰斗,人少了慈爱长者,学生缺了杰出导师……

您走了,您笑着看人生,追求卓越的态度,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里。您在《谈人生》一书中,向人们讲述了您对人生态度的种种看法、见解和主张。您认为:“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对人类发展的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责任感”。您告诉今天的年轻人:“看待自己要有全面观点、历史观点、辩证观点。盲目自大,为我们所不取。盲目地妄自尊大,也绝不是正当的。”我喜欢您的《不完满是人生》这篇文章,将其放置办公桌玻璃板下,每每读之,心态都会变得更加淡定、从容和乐观,知道人生一定会充满苦难,也就不再感觉到苦难的存在。这便是文字的力量和价值。

您在文章中对无端指责或批评您的人,想借批评您而扬名的人,总是客观对待,与那些沽名钓誉的人相比,与那些出卖灵魂和良知的人相比,与那些满口仁义道德干着伤天害理的道貌岸然的人相比,您不知该伟大多少倍。

您走了,您酷爱读书,严谨治学的精

感悟瞬间

□ 张振宇

## 智者独行 永存心间

近日,刚刚读完季羡林先生的《风风雨雨一百年》,季老先生终生不慕虚名、不事遮掩、不唱赞歌的人格魅力深深打动了我。突闻季老先生因病辞世那一刻,脑中浮现出一句话: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季老是北京大学唯一的终身教授,是我国国宝级的大师,是治学者的楷模。季羡林先生在世时,人们出于对先生的敬仰,加封先生“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顶桂冠。如今媒体又给先生冠以如下头衔: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单把这些名称放在一起,我们就可以掂量出一个集国学西学于一身的文化学者的分量。但是,在我看来,先生只有一个头衔也许就足够了:中国21世纪最后一位语言学大师!

季老出生在山东乡下,幼年投靠叔父,得以进入济南读新式学校,10岁初学英文,12岁习德文,19岁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德语专业,并开始接触梵文。24岁作为交换生赴德国留学,一呆十年,主修印度学,研习梵文、巴利文,同时选修英国语言学,并加学南斯拉夫

文。他30岁获得博士学位后开始学吐火罗语,以后又涉猎其他民族语言,终至精通12种语言。其中吐火罗语等语种,已几无传人,这是20世纪风际会的时代,给予中国的馈赠和厚爱。先生之后,能如此广博地集东西方语言之大成者,怕是再也无人可以比肩了吧!在如今“学术”批量生产、“论著”泡沫般膨胀、浮躁、粗陋的背景下,大师的风范更加弥足珍贵。

我最敬佩的,还是季老说真话的坦荡胸怀。他的“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一直让我铭记于心。

如今先生驾鹤西去,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最后一位语言学大师已经谢幕!大师去矣墨香难续,他是属于纸短情长,书香墨味的时代与空间的。虽然没有吐火罗文、梵文几乎无人能识,他也没有可供广播电视循环的唱片录影,但对于接受流行但也敬仰崇高的民众而言,最重要的不是学问,而是治学的精神。我们的缅怀,也正是对一种为学为人精神的重申和张扬,这也应该是“国宝”这一称呼的价值所在吧。

作者单位:十九局集团矿业公司



寒鹭 (国画)

韦选毅画